

电视在过去维系的是“客厅文化”，如今电视都得靠“碎片时间”来存续。但与此同时，正当精英主义们不断诘问互联网带来的大众化“迷思”时，互联网正用自身的某种蜕变来“洗白”自己的原罪，这又是令人感到庆幸的——这种转变也许小得不足为道，但却值得认真审视一番。

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的异军突起，似乎便印证了这样一种“好”。本是被屡屡诟病的世俗化“贴近”，反而构成一种嗅见时代气息的敏感度——“说”什么和怎么“说”，获得了更鲜活的生命力。可以这么理解，跟“说话”有关的网络自制节目，相比传统的内容生产，都在试图跳出框框架架的繁复约束，野蛮生长起来。

网络自制的“井喷”不过是这两年的事。主流视频网站从最初无序的大综艺发展，直到今天的类型节目深耕，一方面是为顺应主流市场的主流需求，另一方面则是逐渐认识到在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差异才是至关重要的软实力。这就构成一个有意思的现象：“短、平、快”似乎不再是互联网追求的终极意义，如何“慢”下来反倒成为大家颇为关切的一个现实议题。看起来本是与互联网绝缘的文化类节目，便成了其中很是抢眼的一股势力，不断逆生长起来。如《罗辑思维》《晓说》等早已家喻户晓的现象级节目，不仅对“互联网上没人好好说话”的既有论调发起了有力的挑战，更对“严肃文化”进行了一次亲民的解剖。事实上，这种源自互联网语境中独特的“说话之道”，或许恰恰更有助于我们理解互联网基因如何影响甚至变革社会观念。

去年，一个原生于视频网站的文化品牌悄然出现在人们的视野里，“看理想”的题眼以一种颇具乌托邦色彩的审美想象，为人们在互联网中营造出一种浪漫的文化空间。这一档新文化节目代表，表现出一股执拗的力量：三个人到中年的儒雅男子，分别认真地跟人谈论起有关文学、艺术和音乐的那些事，“触摸时代”的厚重议题，为浮躁的虚拟生存提供了强烈的人文关切。虽然只是零星的实践，养成这一代受众的“严肃性”也绝非短期能够实现，但这一份从容，却具有了更深远意义。

今年，“看理想”又回来了，并且野心更大。除了延续第一季中的三档品牌节目，“看理想”也注入了新鲜的血液：窦文涛的《圆桌派》和讲述古典音乐的《呼吸》，都进一步扩容了“严肃文化”的讨论范畴，将这一系列的节目扭合成一股更为强烈而自洽的文化势力，供人们进入并讨论。秉承着“严肃地谈论严肃文化”这一理念，本季的“看理想”虽尚未形成爆发式的互联网传播，但这难得的诗情画意倒也很是眼前一亮。

《尚书》并不遥远，地铁就是《荒原》；只有晚上，只在街头；读不完的人类经典，说不完的文明故事，打开梁文道的《一千零一夜》，就会被扑面而来的书卷气和文艺感包围。上季里，他穿梭在午夜的大街小巷，头戴一顶绅士帽，身着一身黑衣，向人们娓娓道来那些散落在历史里的“星星之火”；这一季，他似乎更倾向脚下的社会土壤，从安德森的《想象的共同体》到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大量社会学、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的中西方经典书籍囊括其中，艰涩的学术话语在梁文道的阐释中很是通达晓畅，一本书的多个面向也一并带了出来。对以往文化类节目的超越也表现在陈丹青节目的升级之上。之前的《局部》主要谈论绘画的历史，这次的番外篇《号外》则借助木心美术馆这一微观载体，将目光延伸到更广阔的艺术人文视野。陈丹青在节目伊始提道，“现在我是这个年纪，我看着80后、90后在读木心的书，我不知道这里面会不会走出几个人来，哪怕只是一个人——他会变成一个像这样更有意思的人。”这段轻描淡写的话，比起他之后的讲述更令我印象深刻，或许这是陈丹青做这档节目的意图，又或许这是所有艺术形式所能承载的巨大能量——它会令人变得更好，至少会令人跳出众多低级趣味之外觅得生命的意义。能够看到，如何更有“营养”地说话，是梁文道和陈丹青在上一季节目之后更多思索的命题，这投射在节目文本上，也形成了更丰富的形态变化。

新的两档节目则更为颠覆原有“娱乐大众”的网络主流，聚焦垂直文化领域：一档是来自一位作家爸爸和钢琴家女儿的跨国亲子对话，《呼吸》里谈论的古典音乐，不同于这种看似疏离大众的艺术门类本身，在这档节目里，古典音乐就如同呼吸一样自如而清新；另一档则是窦文涛主导下的《圆桌派》，每期邀请三位不同领域的人来剖解一个具有当下性的议题，如“鲍勃·迪伦获诺贝尔奖”一集中，请到了作家冯唐、

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异军突起

突如其来 的『严肃』逆生长

◎何天平



音乐人张亚东和作曲家刘索拉，同时，“大咖”也没有那么多“辈分”的桎梏，如同互联网赋权人们的平等性那样，多视角平视这一场场讨论便是《圆桌派》的互联网特性。四个人、一壶茶、一炷香和一个社会热点问题构成了全部，类似于传统谈话节目，却远不止于此。纵观既有节目，“郭曹骂战”“马蓉出轨”“张靓颖家庭之争”等选题，是社会矛盾的具体截面，也是对这一系列事件背后蕴藏的社会运行逻辑进行的更本质的探寻。从这一点看来，《圆桌派》更像一堂具有禅意的处世哲学之课。令我印象深刻的一集在谈论“匠人精神”，一部纪录片《寿司之神》引出这一话题，窦文涛跟艺术家徐累、作家曹星原和A站CEO刘炎焱围坐一桌，在嬉笑言谈之中拆解出了工业化时代中匠人精神的存续之道——之于我看来，这恰恰是最具互联网基因的一种呈现，因其探究的本质便是在这一独特时代语境下的文化再现。

与此同时，另一档文化自制节目也在以一己之力探寻着我们所处世界的文化边界。许知远，这位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过去用手中之笔来阐释对中国过去和未来的思索，凝结在诸如《那些忧伤的年轻人》等书中的忧患意识显露着他对生活真实的另一种感悟。而正经历的社会文化嬗变，也令他走出笔墨世界，开始“做一些新的事情”。去年，他用音频节目《单读》在空中和人们一起阅读这个时代；今年，他开启了自己的第一次直播：放一首歌，点一根烟，在原生态的记录中讲述一个“享乐主义者”如何认识这个世界。

随后，一档名为《十三邀》的节目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许知远在这档节目中寻找了十三位具有“模板”作用的个人，请求观察他们的行为和分享他们的个人体验。正在发生的样本“无剪辑”碰撞呈现，而他在寻找的中国发展切片也在一场场真实的思考交换中更为具体地得到呈现。许知远说：“我是一个不太靠谱的作家，试图捕捉时代的精神，却又常常厌恶时代的流行情绪……我对这个过分娱乐化、浅薄的时代心怀不满，希望打破大家思维中的惯性；我也想了解这个迅速变迁的时代，新的动力、新的情绪，与人们的内心世界，我会带着我的偏见出发，等待这些偏见被打破，或被再次印证。”正是这一份冷眼旁观式的“偏见”，在这个喧哗与躁动的互联网时代中更显可贵：跟罗振宇、姚晨、“二次元”社群和冯小刚的对话，都在试图告诉人们，没有什么永恒不变的真理，看待世界的目光也会时移易易。我想起他与冯小刚谈“装”的段落，从“装”到“别装”，再到如今的“装”，被时代的脚步“拖”着往前走的我们，在跟跑之余能够留存一丝“偏见”，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无论是“看理想”抑或《十三邀》，它们显露出的“严肃文化”气质在多数人看来更专属于“精英人士”，年轻一代似乎对此并

不感冒，这样的节目品类大概也与年轻群体主导下的网络市场规律相背。但如同梁文道发出的质询，“谁说年轻人就很肤浅？”即便被视作“垮”在互联网里的年轻人，也会因为一个共同的标签“文艺”聚合到一起。值得高兴的是，这些节目当前的相关数据显示，年轻受众占据了相当的比重——“严肃文化”的逆生长，也许就能搭建起这样一种“慢”的新传统。

当尼尔·波兹曼的《娱乐至死》跟四大名著一起成为通识教育的必读书目，“把我们自己给娱乐死”的时代性预言似乎真的一语成谶了。“消费”被赋予至高无上的地位，“合理”不再是维系社会文化的基本标准，一切意义的生产似乎都消解了它原本的清纯模样：浸淫在互联网里的一代，跟“严肃”慢慢绝缘，习惯于在嬉笑怒骂之间玩世不恭地跟整个世界开起玩笑。

在很大程度上，互联网的崛起似乎是有原罪的：它令人不再感受到“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亲切景致，取而代之的是不断复杂化的虚拟关系带来的冷漠与疏离。对神秘的祛魅和对世俗的加冕，使得社会一再“动荡”——至少是在文化层面的。互联网成为一种“体温”媒介，伴随式的接触带来天然的紧张感，这种“紧张”反复冲刷着原本从容绵软的“人情味”——在午后、在日暮，一架收音机、一台电视机……大概都成了过去时。无疑，互联网的存在使人们的生活不再具有固定的场景性，接受文化的过程亦不再具有盛大的仪式感。

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能够看到互联网的自净属性，大量文化类节目之于互联网平台的盎然生机，其实就在一定程度上纾解了上述“问题”。正如“看理想”系列节目在跟人们谈读书、谈艺术的同时，也在跟人们聊生活、聊理想，如同陈丹青曾谈到的一个穷困潦倒且无人问津的画家的故事，“只要他不死掉，他就会继续做他要做的事情。”虽然，相比综艺的覆盖面而言，这类文化类节目的观众恐怕仍是“小众”的，但垂直化的优质内容所能释放出的长尾效应依然相当可期。



当互联网成为一种普遍的反抗“文化霸权”的手段，文化类节目在互联网上的发展也在试图建立一整套新的描述世界的话语：这种方式可以是“严肃”的，也可以是“戏谑”的，只要是更为个性和自由的表达，都能在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寻找到有力的文化抵抗武器——在这个反传统的时代里，我们还需要一些力量来重建新的传统；在这个崇尚“有用”的时代里，我们也需要一些力量来做点“无用”之事。

圆桌派

窦文涛



和文化人侃文化
跟会聊天的聊天
窦文涛组局
谈天说地
活色生香
10月28日首播
每周三、五更新

中国式『丢书』终不免笑话一场

◎张远

朋友圈的封闭传播机制让“刷屏”这种自我强化、自滚雪球的现象层出不穷，再加上全民微信对于“爆款文章”的迷信，对于“10万+”的“探奇”，导致围绕“刷屏文”的讨论反过来让刷屏现象愈演愈烈。

每隔几日，朋友圈便会掀起一阵刷屏风潮，一场全民讨论，只有在这时，平日里仿佛吉光片羽杂沓堆叠的朋友圈，才短暂地有了共同的交集，有了众口一词的舆论场。然而朋友圈可怕的一面也由此显现，我之所以关闭朋友圈，就是不愿意看到这样周期性的集体高潮——还是背后有推手的高潮。

近日按下朋友圈“集体转发”按钮的是成功制造过“逃离北上广”的新世相。当此前《女神赫敏在地铁里丢了书，结果整个伦敦读疯了》在朋友圈疯传时，大家都在猜测何时会出现中国版。

而新世相一场声势浩大、明星联动、北上广齐动员、10000份免费工具包的方式向大家宣布：在发动文艺青年这方面，无人可以掠美。而且，横跨出版社、地铁、航空、滴滴的合作方，数十位明星名流一起发声，说明了新世相运筹已久且组织力与行动力惊人。环顾文艺圈内，确实再也找不出第二家。

当然，抢跑“丢书大作战”只是第一步，为了独占这一行动的中国“版权”，新世相还特别提到“我们与Emma参与的伦敦地铁读书行动负责人 Cordelia Oxley 取得了联系，并获得了她的支持”。这一聪明的举动不禁堵住了那些叫嚣“抄袭”、“跟风”者的嘴，而且还给人一种“获得中国版权”的错觉，仿佛自此之后中国其他的类似活动就变的名不正、言不顺了。

这种略显“鸡贼”的举动将新世相的野心暴露无遗：成为中国文艺青年“指定”活动组织者。“逃离北上广”这一文艺青年的矫情叹息被他们包装成了一场大型的真人秀广告；被康夏搞砸的“康夏丢书”被他们成功包装成了“文艺青年阅读包”。

如今，连国外流行的“地铁丢书”它们也要以最快的速度打上大大的新世相二维码了。而且，由于他们的组织更为严密、人脉更为宽广、更善于制造刷屏效应，所以他们几乎成了这些活动的“垄断者”，一条驾轻就熟的文艺青年集体活动生产线。

被掌握了嘴点的文艺青年们也开始默认他们的这种角色，以至于忘了“地铁丢书”这种人人可为的活动根本不需要授权，不需要什么可笑的“丢书工具包”，不需要满足同一天10000人集体行动的虚假快感，不需要跟在明星屁股后面亦步亦趋。他们忘了自己根本不需要新世相来激励自己逃离北上广，不需要“新世相图书馆”来告诉自己该读什么书，不需要跟随新世相的指挥棒去投身某项集体狂欢，狂欢过后除了自我感动，不会留下什么。

就像被这次“丢书大作战”如痴如狂的人，不会关心自己的书命运如何，有几个人读，是被买菜的大妈捡回家变卖了废纸还是被地铁工作人员没收。新世相的一句“它也许以失败告终，但我愿意和你们一起试试看。没认真试过，不能说放弃”，已经代替他们卸下后顾之忧。

也许，他们不是被新世相煽动性的言辞蛊惑了双眼，以至于忘了上面这些，而是除了一腔文艺情怀，而无独立思考能力。只能随着康夏、罗辑思维、新世相的旗帜招展而随波逐流。

而书之所以是他们不约而同选择的诱饵，是因为在纸张的黄昏年代，书籍崇拜的回光返照正在让它成为情怀的最佳载体，就像遍地开花的书店正在成为小清新的自拍圣地。

而书籍优越论（包括泛滥成灾的书单崇拜）也不过是在网络信息泛滥时代的一种逃避方式——假定书籍的逼格更高，知识含金量更高，假定付费内容有更多干货。

当然，更多的人把书籍当作了自我价值观的一种标榜，这也就是“标题党”书名泛滥成灾的原因。

就像为都市白领提供穿搭“基本款”的优衣库，新世相不过是文艺青年的“基本款”供应商。

